

綦江发现

从川渝石桅子图腾看綦江僚人遗俗的真伪(廿四)

2025年10月26日,志愿者们在“綦江发现”粉丝邓世全的指引下,来到郭扶镇与坭坝乡代表之家所在的渝贵公路桥下游约50米处、两省界河左岸,探掘独立巨石上唯一的崖墓。研究者有的称其为飞龙山紫云河西岸崖墓,有的则称为花耳岩崖墓。

事实上,该界河名为龙洞河,并非紫云河。且两岸还有“花耳岩”“花二岩”两个极易混淆的地名。这座崖墓距离飞龙山、紫云村、花耳岩的车行距离均约5公里,且不在同一条线路上。为避免误导参观研究者,将其称为“渝贵公路桥龙洞河左岸崖墓”更为妥当。

该崖墓的图案十分丰富,在本考证系列第七篇中,已对其洞口外壁的双阙进行过介绍,本期将通过对比其他刻画,试图揭开崖墓的营造信息等内容。



志愿者观察龙洞河左岸崖墓室内刻画。通讯员 王世垒 摄

龙洞河左岸崖墓洞口外壁右侧,刻有一叶扁舟,舟身两端各伸出一块木板。左端伸出的木板明显上翘,应为船头,通过一根牵绳系在右阙右侧的立杆上;右端伸出的部分较平缓,应为船尾,另有一根向前下方倾斜的线条延伸而出,其功能暂不明确。船上刻有倒覆的“W”型双钩纹路,这一纹路代表的可能是飞翔的大鸟。

而这叶扁舟的特别之处,还在于船身与船尾上沿,叠加刻有一个双钩边线的矩形箱体状物品,矩形中心又刻有一个不规则圆点。若整体观察,这组图案

岩上崖墓群M2号墓门外左侧,有三列隶书题记,内容为:“章武三年七月十日,姚立从曾意/买大父曾孝梁右一门,七十万,毕。知者:廖诚/杜六。葬姚胡及母。”这一题记表明,该崖墓的开凿时间不晚于章武三年(223年)。

需要对题记中的部分字词进行注解:“大父”即祖父;“梁”指“梁堆”,是汉晋时期对古墓葬的俗称;“毕”意为“完

又酷似一只向外游动的水鸟——玲珑的鸟头、明亮的鸟睛、细长尖锐的鸟喙、扁长的鸟身、高翘的鸟尾等部位一应俱全,唯独鸟身过长,比例明显失调。

有趣的是,若将该图案判断为小舟,其“头首”方向与判断为水鸟时恰好相反。在这处“似舟似鸟图”的左下方,刻有一尾头朝墓门的肥鱼,鱼鳞等细节的刻画比其他图案更为精致。此外,洞口右上侧、右阙上方,还线刻有一只肥鸟,其背上的翅膀凿刻得较为夸张,朝后上方斜伸展开,展现出强大的飞翔张力。

单独观察龙洞河左岸崖墓的这组图

案,难以从中获取营建信息。但在距离此处约60公里的岩上崖墓群M5号墓,已知明确由匠师麦孟京开凿。该墓墓门左右同样设有双阙,墓门右上端,自左向右依次刻有“背上带长长飞羽的肥鸟”“鱼”“似舟似鸟图”,且这些图案的头部均背离墓门——与龙洞河左岸崖墓的图案组合高度相似。

对比两处崖墓的这组组合图案,总体来看雕工都显生涩,艺术观感欠佳。其中,“肥鸟”与“似舟似鸟图”几乎完全雷同,尤其是后者,给人“如出一辙”的感觉。贵州省博物馆馆长李飞在《崖上阴



龙洞河左岸崖墓外壁刻画。通讯员 方兰 摄

崖墓匠师麦孟京

案,难以从中获取营建信息。但在距离此处约60公里的岩上崖墓群M5号墓,已知明确由匠师麦孟京开凿。该墓墓门左右同样设有双阙,墓门右上端,自左向右依次刻有“背上带长长飞羽的肥鸟”“鱼”“似舟似鸟图”,且这些图案的头部均背离墓门——与龙洞河左岸崖墓的图案组合高度相似。

对比两处崖墓的这组组合图案,总体来看雕工都显生涩,艺术观感欠佳。其中,“肥鸟”与“似舟似鸟图”几乎完全雷同,尤其是后者,给人“如出一辙”的感觉。贵州省博物馆馆长李飞在《崖上阴

章武三年左右“开”

测采用的是“二次拣骨葬”;M3号墓则应为曾意父亲或母亲之墓。且这三座墓的开凿时间,均早于M2号墓题记中记载的“章武三年”。

结合前文考证,龙洞河左岸崖墓与岩上崖墓群M5号墓均为匠师麦孟京开凿,再考虑到古代匠人的流动性,目前无法确定这两处崖墓的建造时间孰先孰后,但可以基本断定:其营造时间大致在

章武三年前后。

李飞在文中还提到,距离綦江边界约40公里的程寨镇红旗村白村组崖墓群M6号墓,存有“延熙二年(239年)三月廿日”的题记。其中,“章武”是三国时期蜀汉昭烈帝刘备的年号,“延熙”是蜀汉后主刘禅的年号。这两则题记直接证明:綦江、习水等渝南黔北地区,在蜀汉时期一直处于蜀汉政权的有效管辖之下。

“天母女神”新观点

綦江街镇历史文化丛书之《凉都郭扶》,援引了贵州桐梓夜郎历史文化研究会会长、贵州民族大学教授王德坝的观点,并配发龙洞河左岸崖墓图片,提出“綦江崖墓发现僚人遗存‘天母女神’,古夜郎王墓很有可能位于郭扶”的说法。

目前学界的共识是:仡佬族由古代僚人发展演变而来。2020年12月6日,志愿者们曾前往务川县,追踪綦江籍知县张华庭的政声(详见本报2023年11月《“正己化人”张华庭》系列报道),期间了解到:当地如今的文旅地标“九天母石”,被视为仡佬文化的发祥地,洪渡河也被称为“仡佬族的母亲河”。相关传说称,远古时期九天天主派长子“潜祖”下界,在此地被封为“蛮王”,成为仡佬人的祖先;“蛮王仡佬,开荒劈草”的说法,在仡佬族中代代相传。自2009年起,仡佬族同胞都会在此相聚,举行隆重的“祭天朝祖”祭祀活动。

然而,华中农业大学文法学院学者郭津佑,在2019年对务川进行田野调查后撰写的论文《从“石保爷”到“九天母石”——仡佬族生态文化再生产的变迁研究》中,详细揭示了“九天母石”的起源:其原型是2008年之前当地俗称的“石保爷”(即小塘石笋),如今流传的“九天母石传说”,是2009年左右新创作的内容,且传说中的“九天母石”实际为“男身形象”,本质上属于旅游开发背景下的“新创神话”。关于“石保爷”的民俗现象,本考证系列第十一篇已进行过剖析。

郭津佑在调查中还发现:“仡佬之源”这一说法,最初只是务川县政协在2003年编写相关书籍时“无意间取的书名”,书中并未对这一名称的合理性进行论证;“洪渡河是仡佬族的母亲河”,也仅是贵州省电视台与省摄影家协会为举办相关活动,出于宣传需要提出的说法。更值得注意的是,“祭天朝祖”大典举办初期的几年里,因务川县距离仡佬族核心聚居区较远,当地民族文化特征不突出、民族成分恢复时间较晚等原因,其他24个仡佬族聚居地的代表并不情愿认可这一活动,当地部分仡佬族人也对此颇有微词。

郭津佑在论文中提及:“2008年于黔北地区民间收集到《九天大濮》《濮祖经》二书……据传是用仡佬文字所书写……书中有着‘九天母石,天猿守护’的说法。”但他同时明确指出:“这两本古书的成书时间与书中内容,在学界存在广泛质疑。”

《贵州民族大学学报(哲学社会科学版)》2013年第1期,刊发了该校历史系原主任侯绍庄教授的遗作《仡佬文字创造时代质疑》。侯绍庄在文中明确提出三点质疑:其一,“在对如此重大问题进行鉴定时,居然没有历史学家、考古学家等相关人员参加”“由仡佬族文字书写而成的《九天大濮史录》《濮祖经》与史实多有出入,其著作人物及时间皆有依附假托之嫌”“这种仡佬族文字产生时代,不会早于清代晚期,将其指认为早于甲骨文的说法,缺乏科学根据”。

由此可见,若用这尊“诞生仅16年”的“九天母石”(及其相关新创传说),去解释距今1800年的川渝黔崖墓(包括綦江崖墓)的刻画对象,显然与传统民俗研究的学术逻辑不符,二者并无学术关联性。

(未完待续)

特约通讯员 杨友钱

传承中华优秀传统文化 建设中华民族现代文明

